

自聯出版社印行
司馬璐編著

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

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第一部）

編著者：司 馬 璐

出版者：自 聯 出 版 社

香港九龍彌敦道54-64號

美麗都商場二樓74室

電話：3-663029

七 三 年 七 月 初 版

定價：港幣三十元

司馬璐其他著作

當代中國政治
門爭十八年(第四版)
瞿秋白傳 平裝 五元

定價 三元

精裝 八元

中國和平演變論(第五版)

附：古戰錄修記

定價 二元

論愛國主義

五角

請訂閱中國當代思想最進步的

展望

半月刊

討論中國出路大膽敢言

報導祖國現狀態度客觀

文藝趣味濃厚名家最多

目錄

(代序) 我研究中共黨史的態度與方法

第一章 早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運動

第一節 清末提倡新學與中國社會主義思想……………二一

附錄：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三一

第二節 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三七

附錄：中國第一個以「共產黨」為名的綱領……………四五
劉師復……………四五

第三節 中國最早的自稱社會主義政黨的「中國社會黨」……………四八

第四節 研究系及少年中國學會與早期中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關係……………五六

附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六五
李大釗……………六五

第五節 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與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六九

第二章 「五四」運動的經過、意義與影響

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經過·····	八一
附錄：「每週評論」關於「五四」運動爆發情形的原始報導·····	億萬·····九八
「五四」運動經過·····	胡喬木·····一〇五
「五四」運動的回憶·····	鄧穎超·····一〇七
第二節 「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影響·····	·····一一四
附錄：思想無罪·····	陳伯達·····一二二
第三章 「五四」前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演變	
第一節 「五四」前後中國出版的主要思想政治性報刊·····	一三一
附錄：本誌「新青年」罪案答辯書·····	陳獨秀·····一五〇
「新青年」宣言·····	陳獨秀·····一五二
敬告青年·····	陳獨秀·····一五四
第二節 「打倒孔家店」與孔教的修正主義·····	·····一六一
第三節 文學革命·····	·····一七四
第四節 杜威思想與中國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一八五

附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一九四

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一九九

四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二〇六

第五節 羅素思想與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二一一

附錄：我們爲甚麼要講社會主義……………張東蓀……………二一八

復張東蓀論社會主義運動……………梁啟超……………二二九

第四章 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第一節 布爾什維克早期有關民族問題與中國問題的理論……………二四三

第二節 中國知識份子對俄國革命的興趣……………二五二

附錄：蘇俄勞農政府致中國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二六四

庶民之勝利……………李大釗……………二六七

第三節 共產國際直接插手中國政治的開始……………二七〇

附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對華宣言……………二八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包惠僧……………二八四

「七一」回憶（摘錄）·····	李 達·····	二九三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的創造者與奠基者之一		
李大釗先生傳·····		二九五
第五節 中國共產黨的創造者與奠基者之一		
陳獨秀先生傳·····		三〇三

代序：我研究中共黨史的態度與方法

想完成一部忠實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史，是筆者多年以前的心願，最初的計劃，比我辦「展望」還早，一部份稿件也會在早期的「展望」雜誌發表。因此有些朋友屢次敦促我完成這一未了的工作。

筆者從事寫這部「中共黨史」時，我應該指出，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一個歷史家，對於歷史的資料應該採取誠實的客觀的態度。所以，對於每一中共事件，除了扼要就事敘事，並申述我個人的觀點以外，我儘可能推出大量有關中共歷史的原始文獻。讓原始文件為中共歷史作證。如所周知，很多原始文件今天已經是罕見的了。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經許多次改變過他的面貌。作為「一切為政府服務」的目的，着眼點是「當前的任務」；作為一個歷史家的工作，重要的是從「變」的歷史過程、探求背景，分析問題。

筆者始終相信，早期很多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青年，有理想，有熱情，有獻身的精神，有刻苦耐勞的作風，品質優秀。對於這些個別的人而言，我們都應該寄予同情和友誼的態度。沒有他們，天翻地覆的中國革命是難以展開的。中共的成就，中國革命的成就，是集體的創作，包括許許多多無名英雄在內。

筆者曾經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曾經把青春奉獻給這個黨；在延安時，林彪是我們的校長，我先後聽過毛澤東、張國燾、王明、劉少奇等人的課；在重慶時，我在周恩來和董必武的領導下工作

過。所以，我明白，我曾經接觸過這麼多黨的領導人物，我又有過在這個黨內的個人辛酸遭遇，當我執筆時，我應該擺脫個人情感的因素，從事一嚴肅的公正的歷史見證人的工作。

據筆者所知，在中共黨內，有不少優秀的研究黨史的人才，但是，他們的研究條件顯然有種種限制和困難：

第一，中共本身對於黨史的研究，一定要受到黨內權爭的影響，一旦黨內權力重心轉移，任務之一就是修改黨史。權爭一再發生變化，黨史也一再修改，資料真偽就發生了問題。

第二，中共本身對於黨史的研究，爲了符合政治要求，爲了配合政治任務，一定是由黨有組織有領導地集體進行，研究者很難發揮個人的獨立見解。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實際上是一部黨內鬥爭史。中國共產黨是從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註一）。一個在不斷革命，不斷在黨內鬥爭情況中的黨，中共黨員本身對黨史的研究，就難保持客觀的態度了。

一九三八年筆者在延安時，曾讀「黨的建設」一課，其中有一部分是談及中共的黨史的。當時中共中央有一「黨史編纂委員會」機構，由王明（陳紹禹）擔任主委。這一機構由於對外不公開，所以也未見正式出書。不過，在筆者搜集的資料中，相信至少有兩種是屬於王明派的中共黨史資料。一種是一九三四年江西蘇區編印的「中國共產黨——蘇維埃運動的唯一領導者」（註二）。這份資料強調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是正確的政治路線。另一種是，一九三八年延安另一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印的「中國革命運動史」，寫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國共分裂、清算陳獨秀路線

爲止。

一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展開以王明等爲目標的整風運動，其中包括重整黨史。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敘述：「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城所召集的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雖然糾正了從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線，改變了黨中央的領導機關的成份，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但是在黨的很多幹部中間，對於過去的錯誤路線的性質，卻沒有作過徹底的清算。爲着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時期內領導全黨高級幹部進行同樣的討論。這個討論爲一九四五年召集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註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曾通過一項「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文件也曾被收入「毛澤東選集」。

這一文件，特別着重總結了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分裂後十年內戰中受挫的責任說：

「在這十年內（指一九二七年至三七年的國共內戰——引者註）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

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爲嚴重（六屆四中全會是，以王明爲中心的新留俄派在黨中央取得領導權的一次會議；「遵義會議」是以毛澤東在黨中央取得領導權的一次會議——引者註），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爲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爲『後車之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爲着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爲：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註四）

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共黨內文獻，一部分被毀，保留一部真正的中共黨史就更有必要；但是，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共黨史的研究，有破壞面也有建設面。建設的一面是，文革也公開了若干中共黨內的祕密，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共黨史的若干疑案。從這一角度看，所有我們過去對中共黨史所作的研究，也有重新體會、理解和補充的必要。

在中共歷史上，毛澤東爲了希望取得蘇共的諒解、支持他對黨的領導地位，一向對蘇共低聲下氣，說盡好話。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又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响，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

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註五）

可是，不管毛澤東怎樣委曲地百般遷就蘇共，他始終沒有受過蘇共真正的信任，土生土長的中共實力派，他們一直受蘇共領導的歧視，以及留蘇學生的壓制，但是，隨着蘇共領導層勢力的消長與不穩定，中國的「土共」反而愈來愈富獨立性。所以文革反蘇是蘇共長期排斥「土共」（特別是毛澤東）領導人的必然後果，過程也是很自然的。

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的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爭一再反覆，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中共本身否定或篡改。甚致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可能大有不同。所以，今天要鑑定一份中共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全面的知識，讀者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

中共最早的成立與發展，出於蘇聯及共產國際的幫助，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我更同意張國燾以下的說法：「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辛亥革命運動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響；但主要仍是導源於中國內部狀況的需要。」（註六）所以，外力的影響固然有關，卻非決定性的。中共到底還是中國社會本身的產物。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外來侵略的壓迫，殘民以逞的軍閥，經濟落後的國家，腐敗無能的政治，人民的無知與貧困，都是中國共產主義發展的溫床，這些事實是我們不容否認的。

另一方面，蘇聯一心以自己的模型製造中共，甚至屢次使用過強制的手段，也是事實。在理論

上，蘇聯和共產國際是兩件事；在實際領導上，蘇聯和共產國際又等於一件事。在中蘇共公開爭吵以前，中共主要領導者基本上都是親蘇的。中共歷史上某些黨爭，往往也是蘇共黨爭的翻版。例如：過去蘇共反對布哈林，反對托洛茨基，中共黨內也出現一個相應的運動。

中國共產黨既然基本上屬於中國社會的產物，所以，中國社會的特點，也必然是這個黨的副產物。

例如，就共產黨本身的理論而言，應該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爲基礎的政黨，可是，劉少奇會坦率的承認，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健全的工人階級政黨。劉少奇說：「工人成份很少，祇有將出身於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黨員合起來算，才佔了大多數，我們黨今天的這種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們黨內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這就是在黨內反映了大量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思想，也是黨內小資產階級份子傳達進來的。這就是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及政治上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社會來源。」（註七）

在中共歷史上，常有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究竟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究竟是「工人領導一切」？還是「槍桿子出政權」？高饒事件中被清算的高崗會說：中共實際上等於是兩個黨，一個是白區地下工作的黨，另一個是解放區和軍隊的黨。中共歷次黨內鬥爭，本質上都離不開「以黨制軍」或「以軍制黨」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特殊背景。

權力鬥爭既是中共黨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但是，由於中共是一個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黨，絕大多數的黨員，在黨內鬥爭的風暴中，往往是「隨大流」的，所以，用傳統的寫政治史的方法，一定

要把甚麼人分屬於那一派系，有時是很難的。

在中共歷史上，真正公開搞過派系活動而且有過影響力的，可能祇有：以王明為中心的標準的布爾什維克（新國際派，亦稱新留俄派），以何孟雄為中心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反國際派反王明的）。其他領導人中，以陳獨秀為例，當他領導中共時，被稱為「家長」，祇有幾個特別親近的人，並未另立派系，等他脫黨後與托派發生關係，他已不能在中共黨內發生多大作用了。以瞿秋白為例，他在中共黨內帶出一大批學生，許多後日的中共領導人也崇敬他，近於師友關係，而不是派系關係。以張國燾、李立三、劉少奇等為例，這些人一度領導中共，都是經過黨內的合法程序與組織原則獲得權力的，也沒有私人派系。

毛澤東深深地相信，在中國，掌握軍權比掌握黨權重要得多。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能與王明、劉少奇等人先後繼續合作，而與張國燾則難以妥協，理由正是，張國燾過去在中共軍權的影響力比王明、劉少奇等人要大得多。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蜜月，比過去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蜜月更短，理由也正相同。

中共黨史上那些人是真正的毛派，目前還是一個謎。據筆者手頭的資料：彭德懷至少曾經兩次救過毛澤東，所以毛澤東也有過詩讚「彭大將軍」。劉少奇是中共七大中，第一次用「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的人。陶鑄是第一個喊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巔峯」這句口號的人。楊成武是第一個喊出「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句口號的人。這些人後來都被中共的史家稱為反毛派了。將來的中共史家又怎麼說，目前不得而知。

林彪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歷史。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王明的先是『左』傾後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鬥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劉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鬥爭中，鞏固、發展、壯大起來的。」（註八）

據筆者對「唯物史觀」史學方法的知識，歷史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背景，一切過於強調與誇大個人作用的說法，不僅違背科學法則，也是違背馬列主義的。尤其是，不應把中共的黨史和中共某個領導人的政治生命混爲一談。

研究歷史的真正目的，是學習歷史的教訓，避免重犯歷史的錯誤。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本人說過幾句話，我以爲是正確的。

毛澤東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起。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爲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

誤，使辛勞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註九）

「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註十）

本書以中共的原始資料為主。但是，如上所述，即使根據中共原始資料，認真研究，困難仍然很多。

例如，中共原始資料的記載每每出入很多。已經說過的理由之一是出於政治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共組織，重視祕密，若干史實，既無當時原件可攷，僅憑身予其事者若干年事後的回憶，這些個人的回憶自然很難完全相同了。

例如，中共成立的確定時間，它究竟是那一年？那一天？那些人中共一大參加的代表？為甚麼有些中共黨史資料說是十二人，另一些說是十三人？這些最起碼的常識，中共原始資料說法還是不一致的。

例如，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時，當時的黨員人數，一說是三百人左右（註十一），另一說是四百三十二人（註十二），同是中共原始資料，相差的比例很大。

例如，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的開會日期，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至少有三個說法；當時的黨員人數，五萬七千多？五萬八千多？五萬九千？也至少有三個說法。同年的「八七會